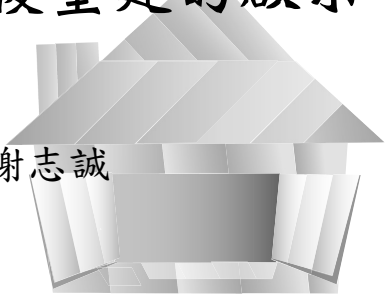


社工專業、社區工作及溪洲部落 協同住宅模式－對莫拉克災後重建的啟示

簡宏哲、蕭至邦、陳竹上、謝志誠



壹、前言

從 1999 年九二一大地震到 2009 年莫拉克風災（88 水災）至今，受災居民與災區原住民面對災後重建與生活安置等議題，已經不止一次在政府與民間產生了政治決策、風險評估、遷置與否、重建模式、文化保存工作等爭議，面臨不斷的訴求、陳情與抗爭事件。具體而言，受災居民不過是為了獲得基本的生活文化權，及一處合乎期待與穩定的家園。同樣為了爭取居住權益的都市原住民，雖然沒有因為受災事件而面臨龐雜緊急的重建工作，但在都市社會環境，數十年來從原鄉來到都市打拼生存，亦需面對經濟、教育、就業、文化傳承等變遷適應因素，以及暫居國有地安置可能面臨拆遷等問題。

本文所要探討的是，從災後部落及社區重建過程中，災區居民（以原住民為主）參與重建規劃的需求，居民的心聲能否向上反應，做為重建決策的考量之一；以及都市原住民社會住宅的協同住宅規劃概念，能否成為未來居民與政府部門之間，共同協力參與

災後重建與住宅（社區）規劃之模式。當然，居民與政府之間的協力參與，除了居民自發性由下而上的表達需求，以及政府機關願意傾聽人民的聲音之外，面對急需救助安置的災民，與少數族群心聲的倡導，該由誰來扮演中介的角色比較適切，本文亦將有所討論。

因此，居民的意見是否得以被尊重？專業人員是否都只能站在由上而下的思維來推動政策，只能配合政府，較少傾聽居民？災後重建除了專業建築工程團隊之外，應該增添何種專業？本文從社會工作的角度，以社區工作方法，透過重大災後重建案例及都市原住民社會住宅的規劃理念，檢視在政府的重建態度、重建團隊思維與地方居民（或原住民）三者之間，社會工作者如何多元理解並發揮中介功能的角色，以做為政府部門、重建團隊與居民發聲的溝通橋樑，進而成為參與重建規劃的專業團隊。

貳、災後重建案例反思

1990 年 6 月 23 日侵臺的歐菲莉(OFELIA)

颱風，在花蓮銅門村引發土石流，受災者多數為太魯閣族的居民，有 36 人遭到活埋，在政府的安排下，12、13 鄰總共 40 多戶人家，集體遷居於現今花蓮監獄旁的「博愛新村」，而銅門村也是臺灣歷史上第一次因為自然災害而集體遷村的案例¹。2009 年 8 月 8 日，震驚全世界的莫拉克風災來襲，造成中南部重大損害，並導致土石流掩埋了偏遠山村及部落。為了加速災後重建，立法院在 8 月 27 日緊急通過《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²，增加特別預算。然而，此條例允許各層級政府針對水患嚴重或土石流威脅性高的區域實施強制遷村或部落遷移，對此「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 Online）報導中³提到，對原住民來說，地理位置及部落社區對於保存他們的文化跟傳統極為重要，因此許多人擔憂「強迫遷移政策」會使得這些文化傳統備受威脅。

不論是自然、人為、科技災害等造成人民的傷亡，災難救援中除了救人、搶修道路、橋樑之外，還涉及災民的緊急安置、慰問與協助、社區生活重建、災難創傷症候群等問題的處理（林萬億，2011）。其中災民的緊急社會安置及後續的災後重建工作，首先面臨到「就地重建」與「遷村」等問題。學者漢寶德認為臺灣的災後重建至少涉及四個範疇，每個範疇都有夠複雜的內涵，而相互之間又多不相容，第一個範疇是災民的願望，第二是國土的復育，第三是原民文化的保存，第四是政治力量的暗潮⁴。

不論是遷移安置或是就地重建，當受災居民及部落的原住民面臨改變根居已久的生活環境，通常是面臨被迫、強制性的選擇而

非自主願意的合理沉澱，尤其是面對國家機器的行政官僚之同時，布興·大立（Pusin Tali）《自治是原住民族的唯一活路》中提到：「根據全球原住民族的經驗，當原住民族與非原住民的國家權力對遇時，往往國家權力的價值觀，是扼殺原住民族各項價值觀的「劊子手」。原住民當知道，一旦生存經驗的價值觀與方式被征服了，原住民族的生命與靈魂，就毀於一旦了」。

這樣的省思與深刻的經驗，從 921 大地震到莫拉克風災，原住民社區或部落的生活重建，必須在此精神與要求下成為各種災後重建工作項目中執行的原則，各界呼籲政府部門，災後的重建規劃除了硬體設施與生活機能的整合之外，更應重視原住民族群體互動與在地連結的維繫。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中有幾段生動的說明，那些因為重大災難，比如 2004 年南亞大海嘯及美國紐奧良州卡崔娜（Katrina）風災等事件，政府的作為如何對受災居民在災後重建上產生影響：

大多數逃過大劫難的人想要的不是空白石板：他們要的是挽救任何能救回的東西，修復被毀損的東西；他們想重新鞏固與家園的關聯。「當我重建這個城市時，我感覺像在修復自己。」紐奧良受創最重的南九區居民卡珊卓，在清除颶風過後的瓦礫時說。

在伊拉克、斯里蘭卡和紐奧良，這個過程被刻意稱為「重建」（reconstruction），第一步是完成災難未完的工作，即掃除公共領域與舊社區殘留的一切東西，然

後迅速以一種商業式的新耶路撒冷聖城（New Jerusalem）取而代之——一切都趕在戰爭或自然災害的犧牲者能重新集結、並要回原本屬於他們的東西前完成。

從臺灣及國外的案例來看，檢視我國政府以往的重建思維，以及各方受災居民、原住民的反應與訴求，政府的決策與執行手法，仍未全面考慮到受災居民的社會、生理、心理層面的需求。不過，政府在考量行政效率與經費來源及社會期盼下迅速擬定重建政策，以及政治「績效」的要求下，通常無暇兼顧受災者的需求與感受。回溯當時媒體所報導的社會觀感來看，比如政府於莫拉克災後初期的作法並未盡符災民之意，尤其是跳過短期（中繼）安置階段直接進入長期異地安置（或永久屋）的作法，使得災民必須在倉促間做出遷居、遷村的重大決定。

臺灣災後重建歷史上並無前例可考的永久屋政策，在莫拉克受災地區被持續執行與接受社會大眾的關注與檢視。從 2009 年開始至今的歷史紀錄，其決策執行過程與杉林大愛村「放棄永久屋」事件⁵，許多莫拉克受災居民皆不約而同地提到當初永久屋「決策太快」，讓災民無法好好思考，以致產生許多爭議。這些問題的原因，在於災後重建中的安置經驗有限，這與銅門村遷居博愛新村的困局雷同⁶。銅門村民被迫遷至博愛新村暫居迄今，直接跳過重建過程，也未處理中繼安置的問題，成為當時政府解決風災所造成危機的處理辦法；而面對莫拉克風災受災地區居民，政府所謂的重建思維，是直接以「居住」為解決辦法，如認定災民有了居住的地方，就可以將災民的社區生活重建等問題也一併

解決，顯然仍有很大的進步空間。

這些過程可見災民一開始的期盼與政府的想像即已背離，受災居民的重建願望是以回到原鄉部落（社區），重啟當初的生活文化、經濟模式為最終目的；政府是以「齊頭式」的安置模式（以慈濟等社福團體規劃之做法為主）做為重建的復原工作模式，並考量國土規劃、土地取得、法律解套、行政效率為第一優先，加上後續的協商過程中，政府未顧及受災居民創傷後壓力症候群，以及如何平復災後的心理壓力與創傷，還有重建部落（村落、社區）永續體系、土地、文化思維等層面問題，致使漫長的重建之路立即蒙上陰影，初期在混亂、倉皇失措與不甚全面的資訊瞭解，災區居民與政府官員及重建團體的介入，面臨「重建與安置」之間的妥善無法達成共識⁷，產生各種的折衝與抗爭不止。

不過，政府對災後地區重建的政策中提出說明，則可以瞭解政府所謂的重建條例一開始，即敘明災區重建應尊重該地區人民、社區（部落）組織、文化及生活方式，政府將以尊重部落歷史與文化角度看待原住民族傳統領域，並提供完善的配套措施等說法（章正文，2010），與重建工作之落實情況有一段落差。雖然政府在面對各種災難之因應，是站在儘速安置災民及快速恢復原有社會秩序而努力，其出發點以聚落安全為基礎是必要的，卻未在重建之後儘速解決災民原本的居住文化及生活習慣等適應問題，在清一色的「制式」組合屋與永久屋的安置上，做為長期穩定災民的緩應之策，這無疑對原本生活在傳統領域的社區居民及原住民族人來說，

在災後創傷的心靈更蒙上一層陰影。

參、災後重建的執行與社工專業

從上所述可以理解，政府災後重建之初，強調重視在地居民心聲與文化傳統的維護其立意良好，問題是執行重建過程的結果，為何屢次產生災區原住民的抗爭事件，及不配合安置居住的政策。我們肯定政策核心面向正確，但是在操作過程出了偏誤，以致於重建美意成了災民的困擾。李丁讚（2010：294）針對災後重建、原住民遷村及被迫離開部落等問題，提出明確的看法與見解：「重建當然不只是房子的重建或提供，更應該包括社會關係的維繫，工作方式的確保，以及生存環境的建立等。離開土地，等於離開土地上所有的社會關係、文化資源和經濟網絡等，而讓人處於文化與社會真空中……。」

如果重建是社會關係、文化經濟與居住生活的再建構，那麼哪些專業人員可以協助政府落實重建工作的執行，及適當回應受災居民的需求，便值得探究。88 水災事件，生活重建與社會福利人員的參與比重大幅增加，居民的心靈慰藉及社會需求受到重視，但事後批評的聲浪卻也不小。88 水災的社會重建，面臨社會慈善組織與救災人員的大舉入侵，並未因為人力、物資的湧入而至獲得加倍的成效，反而產生一些問題。王增勇（2010）提到生活重建中，唯一沒有被重建的就是「部落」，進去到原鄉，組織只是陪伴的角色，而不是一個發展的重點，換句話說災後的重建並不是社會福利來擴大版圖的一

個過程，而應該是回來問在這個過程裡面到底有沒有讓在地的部落更有力量⁸。

本文強調災後重建的過程中，政府的行政工作是將規劃執行與生活重建分開處理，也就是二元化的進行思維。政府提供重建規劃，協助災民辦理社會救助、安置居住等立即需求項目，並且讓許多社會慈善組織來分擔重建的執行工作；而生理照護、心理輔導與社會需求部分，就交由社會福利、社會工作、醫療體系等專業人員來負責處理。可是，災民重建的真正需求卻無法獲得政府決策單位的重視，以至於出現「如果我們不能代表災民，請問你的災民是誰？」的事件⁹，災民的心聲是「這次的風災讓臺灣南部重創，但各地方所受的災害與情況也不同，但所受到的政府安置情況是一樣的，是由上而下的處理，不貼近民心的對待方式，造成我們各地區的災民，在受到政府的安置過程，比天災受的傷害還大」。

可見，災後重建的重要意義，是以災民為主體的整體需求為重建的主軸，才是貼近民意的重建政策，只是協助重建的專業人員為何不能聽見災民的心聲，而政府官員又為何不能接受災民的想法，到底是誰需要被尊重，而重建究竟是要以社會觀感為主，還是以災民的需求為主，誰的聲音才是真正的要被聽見與尊重？先來看災後重建團隊部分，除了建築工程、營造規劃等¹⁰既定專業的配合，要落實尊重地方文化與居民意見的原則，當然需要擁有瞭解在地文化、民眾意願及社區需求等軟實力的專業人員共同參與。因此，災後部落／社區重建工作之規劃，尤其在面對跨文化族群的溝通與執行上，除更

加人性化外，其特有的生活習慣與文化機能，應當融入居民參與設計的藍圖，讓重建工作與住宅規劃更加的社會化。

近年來災變工作的服務團隊中，社會工作者的身影時常穿梭災區為民服務，但是社會工作者不應該只是被刻板的定位在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服務項目之中。社會工作的三大工作方法，除個案工作、團體工作之外，更有中介、宏觀的社區工作，也就是說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還能夠運用社區工作方法，在社區組織及社區發展與社區營造上，扮演專業功能的角色，但此一角色卻常被忽略。社工員面對人為與自然災變，幾乎面臨第一線的救助任務，直接貼近災區現場，並調查瞭解災民的需求與反應，故社會工作者不僅是在社會福利與社會救助上提供服務，更可以發揮社會工作的倡導者、組織者、使能者的角色，協助災民獲得資源、凝聚共識、溝通意見及重建生活自理的能力。不過，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能力，卻因政策導向、機構使命、行政體系等限制，使得社工員成為執行福利救助的工具化，而無法成為站在災民立場發聲的有力角色。

綜觀災後重建可知社會工作者的專業身分，尚未真正成為重建政策制定的一員，而是較多在執行面的功能發揮，如（1）災民本身協助；（2）災民需求反應；（3）災民的潛能開發；（4）社會資源運用；（5）災民生態系統重建與恢復（鄭善明，2010：129），其中以社區工作推行與社區營造再更新，來推動「災民生態系統重建與恢復」功能之角色，並未見到一定程度的任務參與，也就是社會工作者在決策面的倡導只是配角，卻是在社

會救助與福利服務執行面是不可缺乏的要角。

但是災區重建工作等過程，不只是「居住空間」的重建，更是一群居民的集體意識、社會文化之重建過程，這牽涉到部落／社區的重建意涵，蕭家興（2008：69）認為社區重建的內涵包括文化的傳送、社會的整合及社會化等三個面向的建設；以及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社區等新關係的重建，是社區居民相互生活關係的重建，俾能帶動地方社區的全面改造與發展。

透過以上案例瞭解安置居民的心聲，對照政府政策制定的立意是良善的，但是光憑專業本位與政府官員的雲端思考，是無法完全體會原住民文化保存的兼顧與落實，才是災後重建的「根本」。也就是說如何透過「居住形式」與「文化復原」的結合，讓原住民原本的部落意識，再藉由本身的社會運作機制，政府協助資源的運用與土地的取得，來達到災後生活重建的可能性。故建議將生硬的建築規劃與都市治理的方塊式思維退到第二線，重新思索以生活文化為導向的規劃基礎，反轉由上而下的重建機制，以社區工作的概念，尊重部落文化與原住民的生活習慣，政府更應充分理解，讓部落族人真正的參與重建，化解政府與原住民（災民）之間的藩籬。

肆、溪洲部落協同住宅規劃理念

既然提到以社區工作的概念做為災民與政府之間的協商重建與溝通方法，有必要舉出可行的案例提供參考，相較於災區原鄉部

落的遷居與重建工作，都市原住民的遷徙與重建規劃可做為說明。理解都市原住民聚落並非全因災變而產生，而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但無論發生事件為何，重建目的同樣為了「居住」與「文化」相結合，故本文討論在「重建」過程中居民與政府之間，應該有更多元的專業角色，來整合彼此的意見與政策執行的有效性。

以臺北新店溪畔的溪洲部落¹¹為例，部落居民為阿美族，大多來自花蓮縣，移居都會後一直從事基層勞動的工作，都市繁榮加上財團炒地皮，使得房價及租金高漲，從事低收入粗重工作的族人無力購屋及承租房子，只好選擇河川地闢建簡單的房子；房子最初是以木板及鐵皮為建材，在一次大火下，部落幾近全毀，在外界的關心及扶助下，部落族人相互扶持就地重建，雖然也歷經了多次水災，但仍然無法阻斷居民落地生根的堅持，以及對這片土地的情感。

如今，新北市政府溪洲部落阿美文化園區計畫，是一個以原住民文化傳承的社會住宅概念來打造的計畫¹²，主要內容由新北市政府引導部落居民結合公私資源，遵循傳統原民文化於政府規劃的土地上完成自力造屋，政府並協助部落組成法人團體，承租公有土地共同經營管理園區，以達到解決原住民於都市居住問題並傳承、保存特有原民文化的目的，同時並提供市民瞭解原民文化的場域。透過委託專業者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簡稱臺大城鄉所）等專業團隊，與原住民溝通對話理解原住民的需求及心聲，同時兼顧法令程序，社會公平正義情況下，將社會住宅居住權的概念、原民文化傳承，就

養照護自給自足等觀念導入，成立原民文化園區。此例有別於災區的政府部門與重建團隊的專業本位，都市原住民社會住宅的建造理念，應可做為未來災區或地方縣市公私協力重建模式之參考。

新北市政府曾在三峽隆恩埔建造「三峽原住民文化部落」國宅，希望部落居民可以遷入，但因空間規畫不良與經濟考量，導致民眾遷入意願不高，反而選擇留在原地生活，而與政府一度僵持不下¹³。三峽隆恩埔國宅的設計，缺少對於阿美族文化的了解，阿美族生活習性以及部落文化都與「水」息息相關，有世代依水而居的居住文化，但隆恩埔國宅是一般的集合式住宅，並不是針對部落居民而設計¹⁴。

從臺大城鄉所推動都市原住民集體居住正義的行動檢視¹⁵，所長夏鑄九教授等學者提出「協同住宅」的概念計畫，在溪洲部落後方的非行水區，打造部落另外一個家園，希望可以解決長期以來該地區的居住安全與法律解套問題。臺大城鄉所團隊認為要處理都市原住民居住問題¹⁶，是要營造一個部落空間，針對他們的居住文化而建，才是根本的解決方法。因此，夏鑄九教授與臺大城鄉所客座教授延藤安弘合作引進日本「協同住宅（cooperative housing）」模式，並融合了歐洲「社會住宅」的社會福利概念，由市政府提供建材以及溪洲部落原址後方的部分國有土地，幫助居民就近造屋，營造出一個符合部落文化的環境。

綜合規劃資料與報導內容來看，整體計畫案的設計步驟有幾個操作重點，整理如下¹⁷：

- (一)建築物本身將不再只是單純的集合式住宅商品，溪洲部落居民可以參與規畫、設計房子，配合自己的需求，自力建屋打造部落家園。
- (二)採取「先建後拆，就近安置」的方式，首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權，解決租金契約、居住管理等方式，做好內部控管規劃。
- (三)克服人與人之間的疏離關係，藉由原住民生活習慣的互動，在空間上創造出維繫聯絡感情的機制。
- (四)人與自然環境的結合，在土地使用與居住安全的考量下，兼顧傳統文化的保存，以永續經營做為共生意識，不僅造物，更要造人，人與物不離自然環境之培育與照顧。
- (五)土地公有（國有土地），建物共有（建築地上物之家屋、公共設施等產權為部落共有），建築物不得轉賣、不轉租。
- (六)成立法人組織團體「溪洲阿美族文化永續發展協會」自主管理公共事務，進一步形塑原住民與政府的新平等關係。

延藤安弘教授認為，即將遷移重建的溪洲部落，正好具備了協同住宅的根本條件，有（1）自發性與自主性；（2）相互敬愛；（3）物盡其用與混合性（異質性高的）；（4）人性化的規模；（5）開放性與地誌性的；（6）漂流性的計畫；（7）回復與創造人性價值。此外更針對重建工作的專業規劃者，期許其應當動員部落居民，創造出以使用者為主體的空間營造模式，在與居民對話的參與式規劃設計及操作過程中，扮演著美好氛圍、化解衝突對立的多重角色¹⁸（吳金鏞，2011）。

其中，協同住宅參與式設計的特色有（1）

從聰明的個人主義到豐富的共同生活的社區設計；（2）對話的設計，帶來創造性的協同住宅。參與式設計的內涵是由居住者主導的參與式規劃設計，當中思考的關鍵，在於以阿美族文化作為重建規劃的重要元素（吳金鏞，2011）。可見，以使用者為主體的參與式規劃，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共識凝聚，更是居民提供意見及結合在地觀點的人性化設計，重建與規劃過程，亦是部落／社區意識凝聚的展現。

伍、社會工作者的重建參與

從溪洲部落的案例可以發現，以原住民為主體的住宅重建模式，其理念符合原住民族基本法之宗旨及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¹⁹中「災後重建應以人為本，以生活為核心，並應尊重多元文化特色，保障社區參與，兼顧國土保安與環境資源保育」之精神。王增勇（2010）認為，社會住宅之「社會」必須變成一個動詞，住宅要社會化，住宅在生產、建造的過程，使用者可以參與，使用者有決定權，決定公共空間；生產的過程同時也在賦予一種社群的關係，但目前的住宅沒有這樣的過程，房子反映使用者的社會關係，當設計沒有納入，社會關係無法發展出來²⁰。社會住宅的社會化模式與社區工作均是一種藉由集體行動，協助人們自己建立美好家園的過程。

但是，從災後重建與社會住宅政策的推動過程中，最關注少數族群與受災居民的社會工作者，並未出現在居民代表或參與協商的名單之中。本文認為社會工作者透過與居

民的接觸，瞭解民眾心聲及獲取有利重建工作等地資資，調合專業團隊的思考，更可以建立政府、專業團隊與居民之間的中介緩衝，避免資訊整合不夠全面，過度集中硬體規劃的專業、政治績效等，以及溝通上的誤解，而製造出更多不必要的窘境與麻煩。

社會工作者運用三大工作方法之一的社區工作模式，結合個案工作的調查評估，與地方居民建立良好的關係，也可以在資源調查及政策推動過程中，進行政令宣導及意見反應的蒐集工作。所以，社工人員協助受災居民的實質陪伴、心理輔導，提供政府資訊、社區資源的連結，有益於重建工作的順利推動。從而，災後重建或社會住宅參與規劃的社工專業角色，有必要從社區工作的概念來理解。

社區發展工作首要之道，在於協助居民了解社區內的資源與需求，共同繪製社區資產地圖，連結社區內人事物的資源，敦親睦鄰，進而結合外在資源，由內而外共同採取行動來符合社區居民的需求（Kretzmann & McKight, 1993）。社區工作既然是個集體行動，參與者一定有共同遵循的規則，共同擁有社區工作的核心價值。蘇景輝（2009）在其長期參與社區工作之後，產生出四個社區工作者的工作價值觀：

1. 人有其尊嚴和價值：人應被尊重和被重視，不可被侵犯、輕忽或漠視。
2. 人應互助並具社會責任：人對所處社區或社會有其責任，透過彼此互動關懷，則社區問題是可以得到解決。
3. 參與和民主：強調人民自己才是自身需要和感受最佳和最重要的表達者及詮

釋者，人民應該關心，且有權力參與、制訂影響他們生活的決策。

4. 社會正義：社會工作者以社會正義為理想，創造一個「公平」且「合理」的社會，促使一般社區得到平等對待，也協助少數族群的需求獲得兼顧。

學者對於社區工作的目標有諸多看法，徐震（1985）討論「直接與間接的社區工作方法」和「重人與重物的社區工作方法」；也有分為「解決問題」和「能力培養」取向的目標（Rothman, 1969）。前者強調解決社區中某些實質的問題，滿足立即的需求；後者重視促進社區人士的能力，建立社區內不同的族群的夥伴關係，鼓勵社區居民參與公共事務，培養其解決問題的能力、信心與技巧。而甘炳光與莫慶聯（1996）指出社區工作的六大目標：（1）促進居民參與解決自己的問題；（2）提升居民的社區意識；（3）加強居民對社區的歸屬感；（4）改進社區關係，改善權力分配；（5）發揮居民的潛能，以及（6）善用社區資源，滿足社區需要。具體而言，社區工作者得以和居民一起（1）認識社區的共同需要；（2）動員社區的資源；（3）解決社區的共同問題，以及（4）提高社區居民的生活品質。

另外，目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界定包含兩種不同的觀點，一是以原住民為客體的社會工作模式，即以原住民作為社會工作實施的對象，意涵社會工作專業知識的優勢與案主的相對弱勢地位；另一個的觀點則是以原住民為主體的社會工作模式，即原住民是社會工作實施的主體，原住民不僅是服務對象，更是社會工作專業學習與存在的目的與

依據，並將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目標定位為「消除各種形式的種族歧視」與「追求原住民族集體文化權」的實踐（莊靜雯，2005；王增勇，2002；李明政、莊秀美，2001）。

綜合來說，做為以原住民為主體的原住民社會工作者，不論在原鄉或是都市，面對非主流文化的族群文化，自身的跨文化工作模式和文化能力非常重要，黃盈豪（2011）在與部落工作過程中，認為服務提供應考慮不同的族群、文化等背景的影響：

- (一)試著了解性別、家族、少數族群的文化意涵和相互關係。
- (二)反省工作者本身的族群認同和文化對服務提供的意義為何。
- (三)評估的過程要尊重少數族群的聲音，並讓部落組織參與進來。
- (四)以資源整合與在地執行的概念進行服務提供，關注到一個完整的人和關注到一個人背後的族群文化系統。

相對於「以使用者為主體」的建築專業者，社會工作者以原住民（或稱服務使用者）為主體觀點，參與政府協助部落／社區重建工作，必須在尊重與理解原住民歷史文化為前提，透過社會工作的專業知能，反省自身與接受服務者之個體、團體之間的互動關係，加強文化敏感度，做為跨越多元族群社會工作能力專業提升的基礎，也更能突破社會工作問題導向的微視觀點，瞭解差異，接受異同。

此外，社會工作者透過社區工作（社區營造）方法，參與原住民社會住宅之重建，亦能反應民意並倡導政策之制定，符合以下目標（1）以弱勢者為優先；（2）提供各種優

惠措施及適當的住宅；（3）整合社會住宅與社區營造的相關措施；（4）整合資源推動社區家園的永續發展；（5）推動原住民新部落的社區總體營造（林勝義，2010：256-258）。以及，社會工作者之角色，在社會住宅與社區發展的功能上，可以扮演以下角色：（1）告知承租或承購國宅相關訊息及權責；（2）協助弱勢者處理住宅歧視情事；（3）協助社區需要調查研究；（4）協助社區規劃及執行；（5）與相關單位進行諮詢及協調；（6）評估社區發展工作績效（林勝義，2010：272-273）。

所以，社會工作者藉由社區／部落的觀點來檢視場域內的個人、家庭與團體等真正需求，結合自身專業知能與工作任務，讓民意能夠由下而上的與決策者磨合，促使下情上達，以利重建政策的產生與執行更貼近常民需求，是社會工作者未來參與災後重建或社區住宅規劃，所能發揮的角色與功能。

陸、結論

許慧麗等（2010）在探討民間團體參與屏東縣八八水災重建工作模式時提出四個社區復原工作模式，其中社區營造復原模式強調一種由生活者立場出發的思考模式，由下而上，重視居民的參與性，讓社區自己來管理自己，以營造一個可以舒適生活和永續經營的家園。王增勇（2010）從慈濟大愛村的落成為例，說明欠缺對原漢歷史的反省下，漢人對原住民的救助往往淪為一種文化殖民，此次八八風災重建是原漢文化殖民歷史模式的複製，也是社會福利民營化趨勢的結構所致，參與災後重建的社福組織必須要在

原漢歷史的自覺下，以培養在地組織及尊重在地自主的原則下進行。蔡志偉（2009）強調災後重建工作首要關切受援助者自主意識的確立，重建安置的相關規劃必須要以人權為基礎的導向，主要目的在培力少數族群，強調少數族群主動體現自決、自主與自治的基本權利，認為以原住民族文化為本的災後重建，應首先從部落組織的重新建構開始，並以實踐文化傳承、民主機制、法律人權、家園重建、生態永續等為五大面向的守護行動策略為核心。

類此，謝文忠、鄭夙芬、鄭期緯（2011：139）針對莫拉克風災後原住民的遷徙與衝擊研究，整理分析官方文件、媒體資料、會議紀錄與個人反思等素材，進行救災體系分析、民間過程動員論述、災後助人關係檢討、部落再生及主體化反省等，發現這些過程缺乏來自以原民為主體的聲音，災民面對政府強勢主導的遷村及永久屋計畫造成的痛苦和衝擊，並以他們的生命故事和體察為基礎對政府政策加以批判反思。

總而言之，面對未來天災頻仍的全球化與受災地區的重建工作，及跨文化族群的互

動接觸過程中，與地方居民或災民（或原住民）建立良好的信任關係，社會工作者無論是在災區部落、或是受災社區、社會住宅及社區營造的參與過程中，是不可或缺的专业角色，更是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社區的專業媒介。

最後，透過瞭解災區原民部落及地方居民的在地需求，強調社會工作者的參與，可以運用社區工作方法進行社區探訪與文化檢視，透過綜融社會工作的心理、生理、社會面向等評估調查，協助政府未來在災區重建與住宅政策的規劃過程中，有助於專業團隊更深入考量不同文化的特殊性及社會性，除了建築規劃的專業思考外，更凸顯出人文關懷及同理互助的軟性一面，也希望聽見更多災民的聲音能夠被融入重建的需求之中。（本文作者：簡宏哲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生；蕭至邦為亞洲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陳竹上為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謝志誠為國立臺灣大學生物產業機電工程學系教授）

關鍵字：社工專業、社區工作、災後重建、協同住宅

註釋

註1：楊蕙菁（2005）。土石流殺人事件－重返銅門村。商業周刊。2011/11/1，取自 <http://www.businessweekly.com.tw/article.php?id=20741>。

註2：2009年8月7日莫拉克颱風的超級豪大雨，造成中南部地區土石及洪水成災、災情極為嚴重；朝野為了加速災後重建的進行，特制訂了《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全文共30條，於8月27日完成立法。

註3：全球之聲（Global Voices Online），<http://zh.globalvoicesonline.org/hant/2009/09/10/4250/>，參閱日期2011/11/2。

- 註 4：引自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網站，〈新內閣災後重建必須考慮的問題〉，
<http://www.npf.org.tw/post/1/6457>，參閱日期 2011/12/24。
- 註 5：慈濟慈善基金會要在當初的高雄縣蓋「慈濟大愛村」，供災民居住，小林社區災後重建自救會長蔡松諭表示，小林村民表決蓋永久屋地點並非大愛村，除非慈濟能夠依各族群特性設計永久屋並區隔社區，否則小林村民堅持不住大愛村。詳見小地方新聞網：小林村民遷居杉林，但堅持不住大愛村，<http://www.dfun.com.tw/?p=18049>，參閱日期 2011/12/24。
- 註 6：秀林鄉公所經蒐集二年記述風災遷村，完成「歐菲莉災後二十年、重返銅門」紀錄，詳見秀林鄉公所資訊網，<http://www.shlin.gov.tw/un2011-ofeli/index.aspx>，參閱日期 2011/12/24。
- 註 7：對於災後的重建必須真正傾聽部落族人的聲音，正視災後重建過程中的原住民主體，原住民部落重建聯盟對於莫拉克災後安置重建的十點訴求，可參考苦勞網（南方部落重建聯盟），<http://www.cooloud.org.tw/node/46171>，參閱日期 2011/12/27。
- 註 8：引自小地方新聞網：災後一年(3)生活重建中，唯一沒有被重建的就是「部落」，
<http://www.dfun.com.tw/?p=32262>，參閱日期 2012/3/14。
- 註 9：引自小地方新聞網：如果我們不能代表災民，請問你的災民是誰？
<http://www.88news.org/?p=1326>，參閱日期 2012/3/14。
- 註 10：比如地景工程師、土木工程師、建築師、室內設計師等，或比較偏向硬體功能的專業領域。
- 註 11：引自溪洲部落自救會網站，<http://shijou-tribe.cue.idv.tw/modules/tinyd0/index.php?id=1>，參閱日期 2011/12/27。
- 註 12：溪州阿美族生活文化園區 將有別一般社宅，
http://cfminsu.mtaipei.tw/mmnews_1-21593.html，參閱日期 2011/12/27。
- 註 13：參考：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訊網，三峽文化部落 5 成居民付不出租金，
http://www.tipp.org.tw/formosan/news/news_detail.aspx?id=20080524000011，參閱日期 2011/12/27。
- 註 14：本案之協同住宅計畫有關之詳細報導，可參考「大文山社區報」第 1955 期電子報，
http://spirit.shu.edu.tw/plan_upfile/568/20100107095136_plan_1.pdf，參閱日期 2011/12/27。
- 註 15：本案例僅以「Safinawlan 都市原住民集體居住正義願景研討會」的資料來做有限的說明，從中瞭解該案的推動做法與執行方法。
- 註 16：同註腳 14。
- 註 17：Safinawlan 都市原住民集體居住正義願景研討會〈會議說明〉，地點：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公館所，2011/9/24。

註 18：其角色有支援者、協調者、說故事的人、導航人、演講者、設計者、經理人等。

註 19：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中華民國 98 年 8 月 28 日華總一義字第 09800222031 號。參見行政院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推動委員會網站，
http://88flood.www.gov.tw/special_rule.php，參閱日期 2011/12/27。

註 20：引自臺灣立報：居大不易專題 2「社會住宅需納入使用者想像」
<http://www.dfun.com.tw/?p=29259>，參閱日期 2012/3/10。

註 21：黃盈豪（2011）。弱勢族群的保障，收錄於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實務手冊（林萬億編）。高雄市：巨流圖書。

參考文獻

- 娜歐蜜·克萊恩（Naomi Klein）（2009）。**震撼主義：災難經濟的興起**（吳國卿、王柏鴻譯）。臺北：時報出版。
- 王增勇（2002）。原住民社會工作與福利服務。收錄於社會工作與臺灣社會。臺北：巨流。
- 王增勇（2010）。「體檢原鄉部落的災後重建」專輯。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8，269—271。
- 甘炳光、莫慶聯（1996）。社區工作—理論與實踐。臺北市：五南。
- 布興·大立（Pusin Tali）（2009）。自治是原住民族的唯一活路。臺北市：前衛出版。
- 李明政、莊秀美（2001）。原住民社會工作倫理。收錄於徐震（編），社會工作倫理。臺北：五南。
- 李丁讚（2010）。重回土地·災難社會的重建。臺灣社會研究季刊，78，273-326。
- 吳金鏞（2011）。居住價值的再創造—溪洲部落協同住宅參與式設計經驗。臺灣大學主辦《都市原住民集體居住正義願景研討會》，地點：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所公館所。
- 林萬億（2011）。災難管理與社會工作實務手冊。高雄市：巨流圖書。
- 林勝義（2010）。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兼論其社工實務。臺北：五南。
- 徐震（1985）。社區與社區發展。臺北市：正中書局。
- 許慧麗、趙善如、李涂怡娟（2010）。民間團體參與屏東縣 88 水災社區復原工作模式初探。社區發展季刊，131，250-268。
- 章正文（2010）。災後部落重建·找回綠色家園。營建知訊期刊，332，19-27。
- 莊靜雯（2005）。原住民籍社會工作者對原住民社會工作的想法——一位漢籍研究生的初探。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論文。
- 鄭善明（2010）。災變生活重建與社會工作內涵。社區發展季刊，131，117-133。
- 蔡志偉（2009）。災後重建與人權保障—以原住民族文化為本的思考。臺灣民主季刊，6（3），179-93。

謝文忠、鄭夙芬、鄭期緯（2011）。這是「房子」，不是「家屋」：從解釋性互動論探討莫拉克風災後原住民的遷徙與衝擊。臺大社工學刊，24，135-166。

蕭家興（2008）。社區規劃學—住宅建築社區化之規劃。臺北，臺灣：唐山。

蘇景輝（2009）。社區工作：理論與實務。臺北，臺灣：巨流。

Kretzmann, J. & McKnight, J. (1993). *Building communities from the inside out: A path toward finding and mobilizing a community's assets*. Chicago, USA: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Rothman, J. (1969). An analysis of goals and roles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in Ralph Kramer, Harry Specht (eds), *Readings in Community Organization Practice*. Englewood Cliffs, NJ, USA: Prentice-Hall.